

## ※ 研究動態 ※

# 略說揚州學派與歷代揚州文化之關係

田漢雲\*

### 一、辨析清代揚州學派區域性學術淵源的基本思路

以往不少學者論析揚州學派的學術淵源，總是著意考察它和清代吳、皖兩大經學流派的聯繫，這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吳、皖兩派諸大師不祇活動於揚州一地，其及門或私淑者更不祇是揚州籍士人，如果祇注意這兩種區域文化的傳播輻射，似乎很難說明揚州學派形成的必然性，甚至會使人懷疑是否有一個相對獨立的學術群體——揚州學派存在。林慶彰先生等提出探索揚州學派與歷代揚州學術之關係，是既有新意又有深意的課題。近年來，我研習清代經學，自然要去閱讀揚州學術名家的相關著作，進而思考諸如學術思潮之變遷、學術思想之衝突、學者之地理分佈與群體構成等問題，但對這一命題考慮甚少。今有機會與林先生等交流研究揚州學派的體會，謹陳淺見，以祈指正。

歷代揚州學術文化之創造主體有兩部分。一是揚州地區出身的學人。這一類學者的全部論著無論成於何時何地，都可視為揚州學術文化的組成部分。二是來自其他區域的學人。他們的著述，必須是在揚州撰著，方可視為特定時期揚州學術文化的組成部分。假如要編一部揚州文化史，應當包容這兩部分學術成果。

清代揚州學派對中國古代文化具有很強的接受、消化、整合、創新的能力。因此，以開放的眼光從博大精深古代文化中探求它的根基，才可能深刻地理解它。研究揚州學派與歷代揚州學術的關係，實質上是這項工作的組成部分。特定時期的揚州學者在回溯本地區文化史時，一般是看重本地先輩的業績；而客籍學者在揚州的文化活動，到後世很難獲得區域性認同。所以，我們探討揚州學派與歷代揚州學

---

\* 揚州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術的聯繫，大致落實到這一派與歷代揚州籍學人的紹承關係上。至於歷代學者客居揚州時的學術活動對揚州學術的貢獻，當然不可以輕視忽略。可以把它放到揚州學術與其它區域文化的交流融合中考察。

揚州作為歷史文化名城，其初始階段可以追溯到西漢時期。吳王劉濞稱藩而治的四十年間，揚州的經濟文化都有顯著發展。其後一代儒宗董仲舒任江都國相，給後世揚州士人留下引以為榮的記憶。延及魏晉南北朝，揚州一地間有學術名家出現。但是，揚州文化的繁榮與自具風采則在隋唐時期，自此以後可以說代有其盛。隋唐之際的揚州學術以文學研究稱雄。曹憲、李善等人創立文選學，當時享有盛譽，後來在揚州本地一直受到人們的懷念和崇敬。五代與宋世的揚州學術以文字學馳名海內。徐鉉、徐鍇兄弟精研《說文解字》，為人們理解和利用此書作出鉅大貢獻。元代文化以戲曲為勝，揚州戲曲堪稱一方重鎮。睢景臣、陸登善、張鳴善等世所知名。明代的揚州儒學頗具特色。劉永澄、劉永沁砥礪名節，潛研性理之學而兼重事功，影響了揚州士人的操行與學風。

清代揚州學人具有開闊的文化視野，他們從文化傳統中汲取養料時並不以狹隘的鄉土觀念自限，同時又格外珍視故鄉的文化寶藏。

## 二、清代揚州學派的文學主張與隋唐之際的文選學

文選學如今已是學術界公認的一種專門之學。文選學的創立者是揚州學者曹憲、李善。《舊唐書·儒學傳》云：「曹憲，揚州江都人也。仕隋為祕書學士，每聚徒教授，諸生數百人。當時公卿以下，亦多從受業。〔……〕貞觀中揚州長史李襲譽表薦之，太宗徵為弘文館學士，以年老不仕，迺遣使就家拜朝散大夫，學者榮之。〔……〕所撰《文選音義》甚為當時所重。初江淮間為《文選》學者本之於憲。又有許淹、李善、公孫羅，復相繼以《文選》教授，由是其學大興於代。」曹憲是文字學家，除《文選音義》之外，著《博雅音》等文字學專著。他注釋《文選》，所長亦在文字音義。對《文選》研究更為精深的是李善。我的同事顧農先生在〈李善與文選學〉一文中論列李善《文選注》在註音、釋事、釋義、校勘等四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切實可信。業師李廷先教授在《唐代揚州史考》一書中辨析李善註與「五臣註」之優劣，認為李註最善。這也是確當的評論。

曹憲、李善的《文選》研究對後世沾溉甚廣。揚州學派中諸多名家對這兩位鄉

先賢懷有深深的敬意。如阮元，依曹憲講學故址，「爲樓五楹，題曰『隋文選樓』。樓之上奉曹君及魏君（模、景倩）、公孫君（羅）、李君（善及子邕）、許君（淹）七粟主」（《擘經室二集·揚州隋文選樓記》）。這一舉措反映出阮元對選學名流的崇敬，對於在揚郡提倡文選學有重大意義。順便說一句，自唐至清，歷年久遠，而曹氏講學故址依然確鑿可知，表明歷代揚州人都未曾忘卻這些對揚州文化卓有貢獻的先民。

清代揚州學者以曹、李諸人創立文選學而自豪。他們以前人疏釋爲津梁而熟習《文選》，指導自己的創作實踐。特別可貴的是，他們在鑽研《文選》學的過程中勤於思考，在文學理論方面頗有發明創造，並用以引導當代的文學創作。

自康熙朝以下，桐城派古文在文壇上聲勢日益洪大，到乾嘉時期風靡全國。這一派宗奉唐宋古文，強調文以載道。方苞、劉大櫆、姚鼐諸家在散文創作理論上固然有獨到見解，但是重內容輕形式的傾向還是明顯的。姚姬傳講文章八要，以神、理、氣、味爲「文之精」，以格、律、聲、色爲「文之粗」。今天看來，在內容與形式之間意存軒輊，也是有礙文學發展的。汪中要求駢文與散文並重，相對於桐城派已具糾正意義。而阮元則更徹底地否定桐城派的文學理論。他認爲，有韻爲「文」，無韻爲「筆」。《易傳》之〈文言〉「數百字幾於句句用韻」，是「千古文章之祖」。又云：「孔子以用韻比偶之法，錯綜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後人之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且尊之曰『古』也。」（《擘經室三集·文言說》）這就老實不客氣地給桐城文派扣上一頂離經叛道的大帽子。

阮元論文注重依經立言。這在當時是習見的做法。其實阮元的文學觀念更主要的是出自蕭統。蕭統〈文選序〉論文學起源，首先引《易傳》爲據，然後以「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兩句概括文學創作的特徵，以「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兩句概括文學作品的特徵。阮元認爲，優秀的文學作品，應具有「沈思翰藻」、「奇偶相生，音韻相和」的特點。這樣的見解與蕭統文論的源流關係一望可知。

阮元推崇蕭統的文藝觀，很難說完全不帶情感因素。這和古代揚州士民指認某處爲蕭氏文選樓的美意相近，即因愛文選學而更愛《文選》，但是又決非出於狹隘的鄉土文化情結。《擘經室三集·與友人論古文書》云：「夫勢窮者必變，情弊者務新。文家矯厲，每求相勝。」具體言之，唐宋古文，功在「矯《文選》之流弊」。降至清代，古文創作已流於空疏少華，因而有必要提倡「沈思翰藻」以救文學之衰。

揚州學派中有不少文學大家，他們的創作實績有力地支持了自己的文學主張。

汪中的作品駢散俱佳。劉台拱說他「鉤貫經史，熔鑄漢唐，閎麗淵雅，卓然自成一家人」（〈汪容甫遺詩題辭〉），今人也承認不是溢美之詞。阮元的詩情真意切，淡雅曉暢，在當時頗獲好評。他們的文學風格不盡相同，但是都可以在《文選》中找到自己的先驅。江藩曾說：「吾文無他過人，只是不帶一毫八家氣息。」可見，揚州學派在創作上也是立意要與桐城派對抗的。他們的努力有顯著成效。現代的文學史家論清代中期的詩文，多會提到與揚州文學家相關的文壇新變化。由此可見，揚州學者習《文選》而重翰藻，在特定歷史條件有其積極意義。

### 三、高郵二王的詮釋學與徐氏兄弟的《說文》學

揚州學派在文字訓詁方面成就很高。論其學術淵源，關係最為密切者自是顧炎武與戴震。同時，徐鉉、徐鍇對他們的啓迪也不可忽略。

揚學群彥之中似乎無人不精小學，但是最精此道者無疑是高郵王氏父子。二王的訓詁學成就，連最輕視《說文解字》的方東樹也表示由衷的欽佩。王氏文字學著作中最有價值的是《廣雅疏證》。這裡僅據此書略述王念孫及王引之與揚州古代文字學的關係。

《廣雅》十卷，三國魏張揖撰。張揖〈上廣雅表〉云：「臣揖〔……〕竊以所識，擇擇群藝，文同義異，音轉失讀，八方殊語，庶物易名，不在《爾雅》者，詳錄品覈，以著於篇。〔……〕以須方徠俊哲洪秀偉彥之倫，扣其兩端，摘其過謬，令得用謂，亦所企望也。」度過南北朝的漫長歲月，至隋唐之際始有曹憲為其書作音釋。其後《廣雅》研究又趨冷落，直到王念孫著手撰《廣雅疏證》，情況纔根本改觀。

阮元〈王石臞先生墓志銘〉云：「先生初從東原戴氏受聲音、文字、訓詁，遂通《爾雅》、《說文》，皆有撰述矣。繼而餘姚邵學士晉涵為《爾雅疏》，金壇段玉裁為《說文注》，先生遂不再為之，綜其經學，納入《廣雅》，撰《廣雅疏證》二十三卷。」（《擘經室續集》）這是說王念孫作《廣雅疏證》的學術背景。王念孫本人則申述了此項工作的學術意義。他在自序中說：「蓋周秦兩漢古義之存者，可據以證其得失；其散逸不傳者，可借以窺其端緒，則其書之為功於訓詁者大矣！」緣此，他纔甘擲十年心力著成此書。

《廣雅疏證》的撰著，以校勘曹憲《博雅音》為始基。但是從單獨成篇的《博

雅音校》看，有「說見《疏證》」、「辨見《疏證》」等語，可明他對前人成果的重視。檢讀《廣雅疏證》，每每可遇王念孫稱引曹憲、李善、徐鉉、徐鍇成說之例。其中引用二徐說最多。

徐鉉對《說文解字》的研究工作，主要是與人共同校定文本，包括增補漏落之字，糾正時俗訛變之字，勘正傳寫訛誤之字。徐鍇對《說文》進行了綜合研究。他的《說文繫傳》四十卷，含「通釋」、「部敘」、「通論」、「祛妄」、「類聚」、「錯綜」、「疑義」、「繫述」等部分。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讚美此書「援引精博，小學家未有能及之者」。王念孫得力於《說文繫傳》，不僅在文字釋義的內容，也在於方法。現舉證於下列：

一是因聲求義。《說文》「示部」：「禎，祥也。」徐鍇云：「禎者，貞也。貞，正也，人有善，天以符瑞正告之也。」又《說文》「木部」：「橋，水梁也。」徐鍇云：「橋之言適也，矯然也。」又《說文》「隹部」：「雛，雞子也。」徐鍇云：「雛，猶云『初』也。」徐鍇證釋字義，知以諧音、同音字互證。此法也為《廣雅疏證》習用。卷一證「撼」之義為「動」云：「司馬相如〈長門賦〉云：『擠玉戶以撼金鋪兮。』『撼』之言『感』也。《召南·野有死麕篇》：『無感我帨兮。』《毛傳》云：『感，動也。』《釋文》：『感，如字。又胡坎反。』是『感』、『撼』同聲同義。」同一卷又釋「孩」字云：「孩者，《玉篇》：『胡改切，撼動也。』高誘註《淮南子·俶真訓》云：『駭，動也。』駭與孩，聲近義同。」

二是以今語俗語證古語。《說文》：「臚，皮也。」徐鍇云：「今人亦言皮膚也。」又《說文》：「餽，乾食也。」徐鍇云：「今人謂飯乾為餽。」類似例子在《廣雅疏證》中不罕見。如卷四釋「燻」字云：「《漢書·楊惲傳》：『烹羊炰羔。』顏師古註云：『炰毛炙肉也，即今所謂燻也。』〔……〕今俗語猶云『燻肉』矣。」

三是兼明假借引申之義。《說文》：「極，棟也。」徐鍇云：「極，屋脊之棟也。今人謂『高』及『甚』為『極』，義出於此。」《廣雅疏證》卷四：「諷者，《詩序》云：『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風』與『諷』通。」又卷三釋「榛」，指明此字與「秦」相通假，本義為「木叢聚」，後來派生出「積聚」、「極盛」等意義。

四是梳理古今文字之體。此項工作的意義在於規範用字。徐鍇釋「縣」云：

「懸，今人加『心』。」釋「厶」云：「此公私字，今皆作『私』。」（《通釋》第十七）《廣雅疏證》卷一下云：「『剃』與『鬚』同」；「『誦』古通作『餌』。」

《說文解字繫傳》給予王念孫的啓迪可能不止上述四端，但是根據這些方面的觀照，可以看到徐鍇的釋義學確為王念孫的學術前驅。

#### 四、揚州學派的經學與明末的揚州儒學

梁啓超先生認為，清代學術的「中堅」是經學，這個論斷適用揚州學派。清代揚州的經學研究一直相當活躍，成就非常突出。論其淵源，與顧炎武、戴震等人關係甚為密切，與本地區的學術傳統也有深刻聯繫。如果說，相對而言，揚州學派與歷史上的揚州學術的聯繫，在文學研究、文字學研究方面是一種散點式的呼應，在經學方面則呈現群體式的紹承。出現這種情形的原因，除了經學之繁榮原本勝於其他學術，還有重要的一點，是歷史上有些經學名家的學術思想適應了清代學人的需要。

清代揚州經學的初盛在寶應一縣。明清之交揚州遭受了嚴重的戰爭創傷，而寶應縣地處揚州北端，距清江浦不遠，所受影響較小。當時寶應縣開展學術研究的環境優於郡城。

清初的寶應學術頗受明朝本邑學者濡染。劉永澄（1576-1612）是明朝後期名儒，北方學者稱為「淮南夫子」。弟劉永沁（1579-？）是劉宗周所看重的布衣學者。劉氏兄弟在政治上與東林黨人認同，在學術上宗奉程朱理學。二劉在鄉邦的同道有喬可聘、劉心學等多人。至清代，朝廷提倡程朱理學。這和寶應學者的治學範圍相吻合，與明朝後期的寶應學術也相容。王懋竑（1668-1741）、朱澤澐（1666-1732）都以精研朱熹飲譽學林。朱澤澐說：「尊德性者，莫如朱子；道問學者，亦莫如朱子矣。」（《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他和王懋竑都非常注重自身的道德修養，當時人稱頌他們「一言一行以至生平出處大節，舉無愧典型」（王安國〈朱子年譜序〉）。這種品格和當時許多理學家大異其趣。趙執信說：「今之學者，巧飾步趨，深設城府；貌柔而行乖，心煩而言寡；陽倚程朱為祖，陰奉張孔為宗，乃可以擅大名，久高位。」（《飴山文集·送晉二生歸應鄉賦序》）王、朱二人的可敬，正在於學與行的統一。他們研究理學，功夫紮實，持論謹嚴。王氏撰《朱子年譜》，「蓋積二十餘年，四易稿而後定。力疾成編，至易篋前數日，猶不忍釋手」。

至於朱澤澐，從他遍讀二十一史，深考歷代輿地之學來看，足稱博學多聞（參見王箴〈朱先生行狀〉）。與寶應朱、王二家同時，泰州有陳厚耀，以精通天文學著稱，他對後來的揚州學者亦有顯著影響。

王懋竑、朱澤澐、陳厚耀對於乾嘉揚州學者的影響，是這一學術群體公認的。焦循說：「吾郡自漢以來，鮮以治經顯者。國朝康熙、雍正間，泰州陳厚耀泗源天文曆算，奪席宣城；寶應懋竑予中，以經學醇儒爲天下重。於是詞章浮縟之風，漸化於實。」這是說陳、王學術開創了揚州學派樸實嚴謹的學風。朱彬在〈劉端臨行狀〉中說劉台拱「年十五，見王予中、朱止泉兩先生之書，欣然有得，始研宋程朱之學，以聖賢之道自繩」，這可以看作朱、王兩家啓迪後學的一個實例。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七：「（劉端臨）六世祖永澄，問學於戢山（劉宗周），以躬行實踐爲主，子孫世傳其學。至君，又習聞王予中、朱止泉之緒論，深研程朱之學，以聖賢之道自繩。〔……〕君學淹通，尤邃於經。解經專主訓詁，一本漢學，不雜以宋儒之說。」照此說來，明末揚州經學中經清初朱、王諸家，一直影響到乾嘉揚州學人，這條學術發展的線索確實存在。

學術史的發展脈絡不是簡單的線性延伸。乾嘉時期的揚州經學與清代前期的揚州經學相比有了很大變化。如果說清代前期的揚學代表人物尊德性與道問學並重的宗風後來相沿不改，乾嘉揚州經師研究的重點已由宗奉程朱理學轉向宗奉漢儒之學，致用性目標的內容也由提倡節操轉向提倡實學，治學的規模更由對經典的局部考證訓釋轉向全面的總結。但是，雖有這樣的學術變遷，乾嘉揚州經學與本區域學術傳統的聯繫依然相當緊密。劉毓崧〈重修泰州尊經閣記〉說：「泰州爲揚郡大邑，讀書應試者頗多，其經學淵源亦夙有端緒。〔……〕後進諸生能學安定之尊經，則敦實學而不騁游詞；能學心齋之尊經，則務實踐而不流空寂；能學泗源之尊經，則重實事而不涉浮華。」（《通義堂文集》卷七）由於劉毓崧是立足於泰州置論，不可以不提陳厚耀。他推崇胡瑗和王良，實在大可玩味。

胡瑗是北宋初期泰州如皋人。他在蘇州和湖州任教授時，分經義、治事二科教授弟子，「經義則選擇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講明六經」；「治事則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攝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講武以禦其寇，堰水以利田，算曆以明數是也」（《宋元學案·安定學案》）。他以蘇湖教法見重於世，也有補於世。王良是泰州學派創始人。他有一句名言：「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是異端。」（《王心齋先生遺集·語錄》）他自視爲儒者，但是一般認爲

其學非儒學之正宗，「似儒、似道、似禪，亦儒、亦道、亦禪」（趙吉惠等：《中國儒學史》，頁 705）。劉毓崧作為道咸時期的揚州學人推崇胡瑗和王良，意在提倡通經致用，承認以儒學為宗而兼容百家之學。所謂泰州經學「淵源亦夙有端緒」，正說明這種主張的實踐早已開始。

事實也是如此。阮元是在理論上倡導經世學風的揚學名家。他闡述孔子的仁學，指出：「仁必須為，非端坐靜觀即可曰仁也。」（《擘經室一集·論語論仁論》）他所謂「為」，主要指儒者用世的實踐，指「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之道」，或者說是「保國愛民」之道。不難看出，他的觀點與胡瑗、王良有契合之處。汪中論儒家學術傳統，特別看重荀子，認為其學「尤有功於諸經」。究其立論的基礎，是看到了荀學對中國古代政治的巨大指導作用。汪中作為儒者，用心研究久受冷落的《墨子》一書。他對孟子指斥墨子理論為「無父」之論，毅然加以駁詰，從而招致翁方綱的猛烈抨擊。他對《老子》、《呂氏春秋》也發表了精闢的見解。許多學者贊揚汪中治學規模的宏大，這自然不錯。但是汪中學術的重大意義，當是開啓了以致用為目標，以儒學為中心，創造性地整合傳統學術文化的新學風。像汪中這樣以儒學為宗而兼取百家的學風，與泰州學派是有相通之處的。只是由於清代學術界對泰州學派主要持排拒態度，所以很難找到泰州學派向揚州學派滲透的直接證據。但是也非全無痕跡可尋。汪喜孫批評王良與彭尺木的學術號稱理學，實為禪學，證明了汪氏父子對泰州學派是有了解的。況且汪喜孫不是批評泰州學派以儒學與別種學術融貫的方法，而批評其文化選擇的內容，這恐怕也非偶然。

應當承認，經世致用呼聲的高漲是在道光朝。但是其發端或者說「近源」當從乾嘉學術中求索。乾嘉揚州學者中的許多人萌生經世致用的意識，反映到實踐上便是從政的廉潔勤奮。像阮元在兩廣總督任上注重防禦外侮的軍事安排，王念孫奏劾大學士和珅「贖貨攬權」，王引之諫止嘉慶帝加築圓明園宮牆及增宿衛兵額，劉寶楠歷任直隸數縣知縣儉樸自持、視民如傷，都能踵武前賢，且受到後人稱譽。

以上從文學、文字學、經學三方面談論揚州學派與歷代揚州文化的聯繫，只是粗陳梗概，不全面，也不深刻。此外，在校勘學、歷史學、地理學、自然科學等方面，揚州學派與歷代揚州學術文化之間也存在一定的源流關係，尚待我們詳加考索。

我感到，清代揚州學派作為一種內涵豐富、成就卓越的區域文化，其形成是以歷代揚州文化的持續發展和豐厚積累為基礎，其文化構成對以往的揚州文化說來既是發展也是總結。